

N 本期聚焦

# 不能把老龄化归咎于人口政策

程振武

今年1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中国人口与生育政策的一次历史性调整，至此，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那么，如何评价独生子女政策对我国人口、家庭和经济社会的深远影响？独生子女政策是导致老龄化问题的原因吗？“全面二孩”又将如何影响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

##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原因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得到频频点赞。但对于政策出台的时间一直有多种声音，如有人认为，早就该全面放开二孩了；但也有有人认为，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只隔了两年，似乎快了点儿。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基于几方面原因：第一，生育政策本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具体生育政策不是“永久不变”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变不意味着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具体政策不变。事实上，早在1984年中央就发了7号文件，对我国计划生育具体政策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当时提出一方面要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要把生育政策定在一个群众能够接受、合理的基础上。当时我国农村生育政策实行了重大调整，此后，大部分农村实行的是一个半孩子的政策，即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话可以再生一个。在“单独二孩”政策之前，我国生育政策的概况大致是35%左右的人口实行一孩政策（主要是城市）、53%左右的人口实行一孩半政策（主要是汉族的农村）、约9.7%的人口实行

二孩政策、不到1%的人口实行3孩及以上政策。

第二，人口形势出现显著变化。从人口总量和增长速度来看，之前的人口政策有效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上个世纪60—70年代，我国在7亿多人口的基数上，每年出生人数高达2700万—2900万，净增长人数高达2300万左右。而目前，我国人口总量为13亿多，年出生人数仅1600万左右，年净增人数大概650万—700万。相比上世纪60—70年代，人口增长率仅是当时的五分之一。目前人口净增长率为千分之5，这个数字已经和发达国家如美国、新加坡等基本持平。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缩减、家庭小型化等现象出现，一些人口结构的负面影响显现。这些都要求适时地调整生育政策。

总的来说，我国生育政策要在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之间取得平衡。这次生育政策的调整是比较及时的，也是循序渐进和具有科学性的。而未来人口政策变化趋势看，“全面二孩”政策会相对稳定一段时间，这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是有利的。

## 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难题

有人认为，老龄化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其实，不管生育率基于什么原因下降，是自然的过程还是政策干预的过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会出现老龄化。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如欧洲、日本、韩国、美国都受到了老龄化的困扰，他们从来没有实行过我国这样的计划生育，也没有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按照联合国的说法，老龄化是全人类普遍的不可逆转的一个人口现象。只不是有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

已经发生了，有的国家正在发生。

因此，不能把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全部归咎于计划生育政策。客观地说，即便不搞独生子女政策，中国老龄化依然会出现，只不过是早一点还是晚一点、速度快还是慢一点的问题。即便不考虑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生育水平也必然是会下降的。例如，伊朗过去也生4个、5个孩子，但现在综合生育率下降到2点多；蒙古生育率也在显著下降。而这些国家并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一个必然结果。

## “全面二孩”政策的积极影响

根据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头五年内我国平均每年会增加300万左右人口，平均每年出生人口达到2000万左右。它有几方面积极影响：

第一，减缓老龄化速度。根据预测，不放开二孩，2050年我国老龄化程度为35%左右，全面放开二孩，2050年老龄化程度大概能下降到32%、33%，降3个百分点左右。缓解老龄化程度、降低老龄化速度，会使我们赢得更多时间应对老龄化挑战，在物质上、制度上有更多时间做准备。

第二，增加劳动力数量。根据预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到2040年左右劳动力大概能增加3000万至4000万。这对经济长期增长潜力有正向作用，对预防劳动力过快下降伤害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也能为我国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提供更多时间。

概括来说，放开二孩会减缓老龄化程度、减缓劳动力增速，但不能改变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的总体趋势。不能说放开二孩，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面对人口结构总量变

化、面对经济增长潜力等问题，需从人口政策方面寻求对策，同时也应当从多方面发力。例如，要真正应对老龄化、解决老龄化问题，还要靠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还需要加快创新步伐，加快结构升级，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等。

## 实现预期目标应制定配套措施

要真正达到国家调整人口发展进程，优化人口结构等战略目标，单纯出台“全面二孩”政策还不够，还需要抓紧研究制定鼓励生育二孩的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配套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关键是让生育成为人们能承担得起、更能够按照自身生育意愿去做的事情。对此有以下几方面建议：

第一，家庭生育的支持政策、补贴政策。比如，适当延长产假。

第二，妇女就业的保护政策。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有较大影响，应当通过一些具体政策保障妇女就业和职业发展。

第三，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例如，增加妇产科医疗资源；增加幼儿园数量，尤其是家门口能有幼儿园、托儿所，而不需要开车半小时才能到，降低照料孩子的时间成本等。

第四，制定适当扩大家庭规模的鼓励政策。比如，按家庭征税，以促进和老人住在一起或住在附近，家庭规模大了，照料孩子就更容易。再如，新加坡买两套紧挨着的房子，可以享受贷款优惠。总的来说，目的就是使家庭的规模适当地大一点，恢复家庭生育、养育的功能。

（作者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来源：解放日报

观点集粹

# 2015年理论热点要览

## “十三五”规划建议描绘发展全景式图谱

学者认为，“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六个必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纲”与“魂”，明确五大发展理念，是关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全景式战略图谱。深化各领域改革，让民众对改革有更多的获得感，是“十三五”规划的核心目标。未来5年，中国经济将继续稳定保持中高速增长，6.5%将是经济增速的下限，只有稳定的增长，才能更好地推动各领域改革。

学者分析认为，“让人民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检验改革“含金量”高低的重要“标尺”。随着“十三五”规划出炉，各项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力转变、公共服务的持续升级、社会建设的不断完善、绿色发展道路的确立，中国百姓的幸福指数也将会不断提升。中国特有的五年规划，本质上是人民的发展规划，有助于13亿全体人民通过教育投资、社会保障等人力资源投资，实现全面发展、幸福发展、健康发展。

## 供给侧改革注重结构优化 开启经济增长动力新周期

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侧重于企业微观机制的重构，提高要素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高经济效率。有学者认为，供给侧改革不是回到计划经济，而是要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的有机结合。有学者认为

为，供给侧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供给和需求两侧的互相衔接与良好配合。还有学者认为，从注重需求侧到强调供给侧，明确供需两端同时发力，这是决策层对未来宏观调控政策达成的重要共识，这将有助于开启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动力的新周期。

## 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 探索符合经济规律的制度

有学者认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重在掌握和遵循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有多个层次的内容，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应掌握和遵循人类社会的一般经济规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和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要掌握和遵循几个社会形态

中存在的经济规律，如商品经济规律、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律；更要研究掌握和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有规律。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保持和增强生命力，必须研究这些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情况，必须科学回答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增强自己的有用性和解释力。

## 落实“一带一路” 积极推动双向开放

有学者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已逐步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这对双向对外开放提出更高要求。有学者认为，把“一带一路”、亚投行、自贸区等战略规划落实到位，就要继续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从“大进大出”到“优进优出”，从供给

侧改革入手，在对外出口领域改变需求减弱的现状，以优秀的产品撬动别国的购买欲望，优化对外出口的产业结构；一方面在利用外资上不会再“来者不拒”，另一方面则还是要给外资吃“定心丸”，积极提供各种服务，有方向地欢迎和鼓励外资进入。

## 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为契机 抗战史研究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学者指出，在那场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伟大决战中，在长达14年的抗战特别是8年的全面抗战中，中华民族遭受了惨重的牺牲。其间，有人丧失了信心，有人屈膝了，有人投降了，有人助纣为虐了，但是，“协商民主”只是一个例子，相信还有很多，我们需要的是围绕这些核心概念一个一个梳理和积累下去，形成自己独立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但我认为，在解释别人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抱有对他者文化的基本尊重，不能像西方的东方学那样，把别人像小姑娘一样随意打探，用概念作为标签，随意贴在别人身上，甚至贬低或者诬蔑他人。

成问题，外来概念对本国话语和思维会起到格式化的效果，将本国社会和政治中的核心意义遮蔽、覆盖和修改了，长期下去，文化主权自然会削弱，也很难谈文化领导权。

“协商民主”只是一个例子，相信还有很多，我们需要的是围绕这些核心概念一个一个梳理和积累下去，形成自己独立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但我认为，在解释别人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抱有对他者文化的基本尊重，不能像西方的东方学那样，把别人像小姑娘一样随意打探，用概念作为标签，随意贴在别人身上，甚至贬低或者诬蔑他人。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 “打虎拍蝇”引发的思考 廉洁政治建设迈向制度化

有学者认为，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的反腐行动，不仅在实践上淬炼了纪检监察机关，也在理论上引发了对党纪与国法关系的思考。中央纪委就党纪与国法的关系指出：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要求决定了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国法是所有公民的行为底线，党纪是对党组织和党员立的规矩。这说明党纪与国法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不与党建结合起来，就无法完整理解中国的依法治国。

十八大提出要“建设廉洁政

持抵抗，坚持正义战争，坚持阵地战与游击战的战略配合，坚持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积小胜为大胜，用持久战的理论指导战争的进展，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中流砥柱，终于经过苦战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那几年是何等艰苦卓绝，中华民族在浴血奋战中浴火重生，需要深化细化研究，用鸿篇巨制的史书来详加记载。

治”，要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后，有专家认为，这标志着反腐败的终极目标首次被正式确立，是指导今后反腐倡廉建设的总方针。经过3年的“治本准备时间”，2015年，反腐成为中国大街小巷最具热度的话题，与反腐风暴相呼应的是一系列落地有声的制度性建设。梳理一年来的反腐行动，有学者认为，有七大亮点值得关注，一、反腐没有休止符，二、明确党纪严于国法，三、海外追逃造成反腐“第二战场”，四、对“团团伙伙”、“山头主义”零容忍，五、聚焦群众身边“苍蝇腐败”，六、反腐不力将被追责，七、专项巡视“利剑出鞘”。

## 屠呦呦获得诺奖 对教育界的启示

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对于屠呦呦给中国教育界的启示，有学者认为，一、做学问要“坐得住冷板凳”，要有“克服浮躁，长期努力创新，献身科学研究的牺牲精神”，要大胆质疑、求证、创新，从而取得关键性突破，而正是这点，尤其值得教育者深思。二、学术研究

的突破在创新，而创新突破的动力来自于不迷信权威、敢于质疑和批判，要尊重和呵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探索精神，这恰恰是当下教育所欠缺的。三、在中国，不少科学家没有把“求真”放在很高的位置，这种情况在教育中也存在，教育评价和科技评价都被另一种忽视“真”的价值意识所渗透，直接操控、误导或左右着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李伦）

N 学者观察

# 敢于用中国本土概念解释别人

苏和

一种理论要具有更强的解释性和吸纳能力，它在能够解释自身的同时，也能通过对他者的解释能力乃至在被他者接受过程中产生扩散效应。因此，中国制度模式和制度体系既是“土特产”，但又不是“土特产”，理论从特殊到普遍的惊人一跳，往往在于构成这个理论的关键概念，完成了从描述某一特定现象的专有名词，扩大到解释更广泛现象的普通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说某一理论是“中国特色”的时候，这还只是思维的第一步，这种特色要具有世界意义，还必须勇敢地迈出第二步，应该能够在解释外部世界或者在被外部世

界接受的过程中，完成从专有名词到普通名词的升格，变得具有普遍意义。

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有许多同义异名和同名异义的概念和表述。西方说“宁在乡村当首脑，也不在罗马当副手”，这个表述在中国就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们讲中国的协商民主，可以说是中国民主的独到形式之一，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专有概念，但是这个概念要有扩散能力，就需要用这个概念去研究别人，通过在发现和解释别人过程中，这个概念就不是中国专有的了，就变成了一个普遍概念。

所以，就需要我们有理论自信，去发现其他国家和社会中的协商民主成分。中外学者一起研究，

这个概念就走出去了。但是，关于这个概念的原创权在中国，别人研究协商民主的时候，文献追溯首先要引中国学者最先的看法是什么，中国的民主政治是如何对此形成安排的，通过这样，我们就掌握了这个概念的发明权和解释权。我认为这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内容之一。现在学界有种风气，就是什么概念都追溯到希腊和西方，长期下去，自己的学术史、学科史就没有了，源流就接到别人那里去了。这是不对的。

长期以来，我们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概念基本来自西方。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如果充斥着外来概念，那么本国的学术表达一定会成为问题，对自己的认识、理解和表达也会

就希望房价下跌。这些都是人民，你不能说谁不是人民。

对于这些分歧如何解决？一旦分歧明确以后，就会影响人们的判断。我们发现所有民主程序和过程，只能征求更多利益表达和更多立法意图的理解，但是立法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要平衡利益和分配利益。除非各方利益能够妥协，在妥协当中达成一致，民主过程本身是不能消除利益分歧的。

一定要用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缓和利益分歧和冲突，尽可能把这个冲突保持在社会的政治秩序范围内。也就是说通过立法或者具有立法意味的行政措施或者政治决策，包括具有立法意味的司法来协调利益冲突。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来努力实行综合分配，平衡各个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一定要努力培养和创建现代中国人的共同体感。人不会关心陌生人，除非陌生人在某个方面进入自己的共同体，你才会愿意与他分享某些利益。一定是在一个群体内，才可能对所有人来实行分配。要尽可能把中国所有公民都纳入到这个群体当中来考虑，有了这种共同体感，才可能在分配利益的时候，考虑到平衡的部分。

共同体感靠什么来建立？很大程度靠平衡各种利益慢慢培养，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建立？主要不是

靠学者来说服，我觉得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引发了社会分层、职业分工、利益分歧，导致立法上的难题，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经济社会的发展在重构中国社会。

政治精英作为立法者和政治行动者，必须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必须继承“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在一个非常开阔的视野当中去理解，不但要能够理解分歧，而且要能够明智地应对，要整体谋划长远利益、现实利益、各个利益的平衡。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报

N 有此一说

# 建立共同体以平衡利益分歧

朱苏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过去这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快速的发展，劳动分工细化了，各行各业出现了，社会分层显著了，不仅仅收入差距大了，而且围绕着许许多多的问题，甚至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都很激烈。

我们的法律是反映人民的利益的，但是，人民本身不再像过去那样铁板一块了，那个抽象的人民，今天在职业分工、劳动分工当中，具体化和分化了，他们具体的利益其实已经跟人民利益的概念不一致了。人民对当下的利益判断会有分歧，比如我们讲的买房问题，我买了房就不希望房价下跌，我没买房